一等奖获得者

中文投稿

无主领地：女性主义构造世界与影像

柏林世界文化馆，柏林

2022年6月19日—2022年8月28日

译/梁霄，校译/潘靖之

**世界的和女性的：无主领地**

**凯瑟琳·亚当斯**

在柏林HKW美术馆近期举办的展览“无主领地：女性主义构造世界与影像”的入口处，人们会直面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1983年的装置作品《我想说的太多，太多》（*So Much I Want to Say*, 1983），它沉静地吟咏道：“……我想说的太多，我想说的太多……”。艺术家本人所饰演的女主人公的声音搅动着周遭的空间，断断续续地寻觅着新的对话者。这件装置的音频显然是叠加的，覆盖了这部5分钟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场景——在影像中，两只大手（能隐晦地看出是男性）堵住了发声主角的嘴。也就是说，哈透姆的声音并非来自那个“影像现场”，而似乎是发自内心。这件作品是展览所囊括的众多影像作品中唯一一个采用外放音频手段的装置——所有其它的影像作品都配备了单独的耳机。当观众步入展厅别处，虽然已背对作品，但那吟咏依旧持续萦绕于高低起伏的电影装置群落。哈透姆那空洞的、令人无法喘息的叠句，似乎扮演了合唱团中的策动角色，在众多的影像中上演着一场突袭，并敦促我们前行。然而，当移动影像变为纯粹之声时，人们轻易就会忘记，《我想说的太多，太多》实则是一部关于受钳制的沉默的作品。

展览“无主领地：女性主义构造世界与影像”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女主义影像作品，这些作品将直接的、通常是纪实主义的现实主义与实验艺术家的电影美学相结合。展览中的作品跨越了诸多地理位置和主题。在强调“构造世界”作为其基本概念的过程中，《无主领地》提出了诸如前卫蒙太奇和主观主义特写镜头等电影技巧——实际上，这些技巧分解了，而不是统一了电影的“世界”——作为女权主义者重新组合既有社会条件的策略。许多这样的作品看起来就像追随了哈透姆的实践——反对那种投机的、乌托邦式的“世界化”，这种“世界化”暗含着“构造世界”本身对本体论重构的渴望。展览中的作品使用割裂和剪辑等电影摄影手法来引起人们关注少数主义政治声音和多数主义文化之间的不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展览对“构造世界”概念的依赖似乎比其预想的更具有挑衅性。

作为一种文化过程，“构造世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统一的、本体论上的和概念上具有凝聚力的艺术情境的构建。近年来，它在当代艺术中愈发常见，被用来描述如下策略的使用，即将通常被压抑的文化生活想象为自主的或具有社会政治效力的。从更哲学的意义上说——源于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对该术语更早之前影响深刻的理论化——“构造世界”意味着通过形式一致的结构对艺术创作的折射。这一词汇也常见于计算机编程或游戏语境下的探讨，为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也许是多元的）美学方法。

尽管展览专门为女性打造了无主领地这个欢欣鼓舞的由头，但存在主义的模糊性还是主导着它的主题作品。佩吉·亚维许（Peggy Ahwesh）的作品《她的木偶》（*She Puppet,* 2001）将一个劳拉·克劳馥（Lara Croft）式的角色卷入了同名电子游戏的穷途末路的场景之中。我们发现克劳馥——由亚维许激活——不幸撞上石墙，最终沉入水中，或被群鸟无情地叼啄。韩玉姬的作品《无题*77-A*》（*Untitled 77-A,* 1977）运用了前卫的影像剪辑和拼接技术：作品自反性地记录了艺术家在工作室和城市环境中的电影摄影姿态，但其也讽刺地将这些剪辑视为对一个更大的社会主体的暴力切割。我们看到艺术家控制着一长串的胶片，在暗室里思考着可能的构图——然后是并行的场景，剪刀戳向白墙，红色颜料如鲜血般从其后喷涌而出。

在视觉化呈现女性主义的破裂是如何被强加在男权电影背景上时，与纪录片性质更为接近的作品也同样具有冒险精神。萨拉·戈麦斯（Sara Gómez）的作品《我的贡献》（*Mi apore, 1972*）详细描述了在传统社会中缔造新的家庭结构所遭遇的变幻莫测。在探索阐明女权主义立场所必须的社会“剪辑”时，作品也暴露了当时古巴妇女运动内部的裂痕。展览中的其他一些作品则以一种带有压迫色彩的方式戏谑机会主义的自我物化，比如罗宾·劳里（Robin Laurie）和玛戈特·纳什（Margot Nash）的《我们以取悦为目标》（*We Aim to Please, 1976*）*。*与韩玉姬的创作一样，许多作品更多聚焦于家长式期望的冲突性破裂或创造性利用，而非如人们可能预期的那般，在一个没有主人、不受控制的“世界”中找寻解放的、独立的想象。作品《强奸案的审判》（*A Trial for Rape,* 1979）由来自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团体（Anna Carini, Rony Daopulo, Paola De Martiis Maria Grazia Belmonti, Annabella Miscuglio和Lorendana Rotondo）拍摄，记录了一名女性原告遭遇的法律攻击，她试图以强奸罪起诉三名年轻男子。原告律师优雅而精彩的演讲招致了被告辩护律师的系列反诉，并完全歪曲了案件事实的措辞，以至于女孩必须为她的道德、生活方式以及危险的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辩解。

在一个主人遍布的“领地”，很难说任何这些作品没有充分牵涉其中。此外，它们似乎由于某种政治虚空而感到紧张不安——充满了对更为自由的生存的希冀，却缺乏条件或社会的团结来予以实现。展览抱持着尖锐的现实主义态度，冷静地审视着那些有时难逃失败主义的壁垒和约束。如果对“世俗”（worldliness）的激进开放并没有通过被视作独特作品的影像来加以实现，人们可能会转而寻求展览装置本身来提供这种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展览囊括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基本上没有采用“视频装置”的形式——其中许多是完整的电影，通常在半小时左右，或者更长的时间。相比于展览时间通常诱导的那种关注，它们似乎要求一种不同的关注模式，这使得影片脱离了它们自定义的叙事连贯性。“无主领地”创造了一种观看的情境，这种情境下，人们在循环的数字格式间不断地捕捉移动图像。这不是一个有利于明确结束或开始的环境，但装置所制造的迷失效果可能与展览的空间和去地域化概念保持一致。

在这些“不完全”的世界里，一种策展上缺失的动力是对作为其自身非领地形式的边缘或外围的关注。虽然展览的名称源自导演郑明河（Trinh T. Minh-Ha）的文集《当月亮变红》（*When the Moon Waxes Red*），但统一的装置规划似乎淡化了郑明河自己所关注的权力差异。“再一次的，如果没有特定的迁移，边缘可以轻易地安抚中心……”【注1】同样，该项目从语义上解决了“女性”这一范畴的问题，并在展览图录中指出，作品希望从“最大限度的包容意义上”来理解女性，即便这具有某种常态性。虽然此番确认本身可能具有价值，但这只是众多方式之一，而恰恰是在这些方式中，“无主领地”的女性主义领地仍被主宰，仍被束缚在女性与男性分离的霸权且性别化的世界当中。

“无主领地”展览中的艺术家们把世界拆开，但并不急于将其拼回。尽管展览认可“构造世界”的过程，但其中的许多影像都在一种不可逾越的、几乎是令人沮丧的范式中运作。显然，展览试图通过松散的编排创造一种无可指引的形式，但作品本身已经提供了各自版本的迷失。“无主领地”未能护送我们通达任何女性无政府主义的氛围环境，跨越政治阻力的摩擦与裂痕，虽然这有悖于此次展览的意图，但这或许是件好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孩子、亲属或家庭形式彼此联结的世界形式，恰恰是一种经常被用来对付女性的组合方式。此外，它不仅是男人用来对付女人的武器，也是女人用来对付女人的武器，并作为某种壁垒把控着“性别”本身。

展览参观结束之后，观众必须再次回到莫娜·哈透姆的《我想说的太多，太多》。借由最后一次审视，这件作品得以展露自己全部的特征。正如艺术家所言，这正是一件关于边缘性的作品，关于试图通过某个渠道发声，却被另一渠道封堵的作品。【注2】然而，貌似重要的是，我们别太快屈从于这位女性的希冀之声，策展人通过让我们在参观展览时背对说话者所面临的困境，将她的声音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于观众而言，那轻若游丝的语调已然变为了无形的警笛或神谕，在我们行将离开之时，它再度以“声音”的形式重回视野，我们必须再次直面一张被堵住的嘴——一位被胁迫的女人。为何平权不能促成更广泛的性别平等，哈透姆和这里提及的许多其他电影人都已传授良多。他们呈请我们超越仅由言论自由带来的喜悦，并单刀直入那些仍须摧毁的世界。

【注释】

【注1】Trinh T. Minh-Ha, *When the Moon Waxes Red: Representation,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1991: Routledge), p. 17

【注2】Elizabeth Mancester, “Mona Hatoum, So Much I Want to Say,” *Tate Modern*, accessed online at: 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hatoum-so-much-i-want-to-say-t07536

**凯瑟琳•亚当斯**是一位生活在纽约的写作者、策展人兼研究者。她是耶鲁大学的哲学学士，目前于纽约巴德学院的策展研究中心攻读研究生课程。她的写作与艺术评论见刊于art-agenda（e-flux）、*FLAT Journal*和*Triple Ampersand and Dance Art Journal*等刊物。2022年夏天，凯瑟琳在被誉为德国当代文化发展实验室的柏林KW当代艺术中心担任策展研究员。她的研究集中在当代艺术的行为艺术与多媒体理论领域。她的策展研究与独立项目关注了视觉政治、当代艺术中的可操作图像及批判实践的基础设施。2021年以来，她独立策划了纽约米里亚姆画廊的诸多展览与项目。